

doi: 10. 13582/j. cnki. 1672 - 7835. 2016. 06. 009

# 论我国改革开放后“1 + 9”的变化<sup>①</sup>

刘林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较,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近 4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大发展。这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符合党情、国情和世情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结果。

**关键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7835(2016)06 - 0053 - 09

## On “1 + 9” Changes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Lin-yuan

(Research Base for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m,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ostly featured by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has carried 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nearly forty year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biggest change lies in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nks to the CPC’s adhering to the ideological guidelin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important decision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conform to the Party’s conditions,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world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较,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是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模板进行实践的,经济建设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原则,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并不是很成功的,它的僵硬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过“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sup>[1][49]</sup>) 经济发展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党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文革动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因此,不仅需要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而且要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

① 收稿日期: 2016 - 05 - 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ZD001)

作者简介: 刘林元(1941 -),男,江苏靖江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继垮台,更坚定了我们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13]</sup>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的迅速发展,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人民身临其境,感受颇深。这方面的变化,国内外有目共睹。经济的大变化是由其他9个方面的变化引起的,所以笔者就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概括为“1+9”的变化。“1”的变化就是经济的大发展,这个变化全中国人民公认,全世界都知道,看得见摸得着,这里就不用笔者着墨了。下面就其他“9”个方面的变化一一做些评析。顺序如下:

-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中国国情的新认识
- (2) 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3)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提法
- (4) 从单一的全面的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
- (5)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
- (6) 从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为辅
- (7) 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论取代“战争与革命”主题论
- (8) 由封闭转向开放
- (9) 思维方式的变化:由强调对立斗争到强调统一、合作

##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但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我们被一种理想主义所支配,在经济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一两次的大跃进,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提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离开国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建设,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使我们吃了大亏。在结束“文革”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领导下深刻总结了不顾国情,急于求成的“左”的教训,对我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进行重新认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使我们认识到:我国虽然进入社会主义,但经济还很落后,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我国处在“初级的阶段”,经过几年的酝酿,到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进了党的决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任务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据。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说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是欠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经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我国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但经济还很落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与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正因为我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指导思想,要在现阶段干净彻底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功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要反对两种片面认识:一种是否定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明确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们

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sup>[2]344</sup>第二种是,要防止和反对“左”的认识和办法。邓小平说“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sup>[3]312</sup>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使之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支撑,是将两个认识作为前提条件的: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点是穷,经济落后;二是如何改变落后的现状,只能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由改革促发展,国情——改革——发展,这就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路,也是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衷。

邓小平提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根据是,经过“三大改造”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落后,生产力很不发达,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20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强调是“初级阶段”?前面已说目的是为了更稳妥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上还很落后,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有一些旧社会旧制度的东西,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要注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同时更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不顾客观基础,不能超越阶段,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急于求“纯”。需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这样一个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从国情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发展经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把社会主义稳步推向前进。今天确认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对改革开放做出决策时,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社会主义完美主义的理想目标出发,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完美性。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不仅做不到,而且是有害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深刻教训的。现有资料表明,毛泽东主席从1956年开始就提出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穷,就是经济落后;白,就是科学文化落后。在大跃进年代又反复讲,中国“一穷二白”,但这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美最新的图画。他对当时国情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只是他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提出概念,而在于如何对待这“穷”和“白”,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豪迈的志气,也是浪漫的理想。毛泽东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实际上是很急的,他急于改变祖国面貌,把穷变富,一方面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赶英超美,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口气。他提出的“三面红旗”今天看来实际上就是解决“初级阶段”的贫穷问题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向贫穷宣战的号召书,动员生产大跃进就是发动人民群众依靠干劲和意志的力量,苦干蛮干把生产搞上去,实现经济跃进式发展。人民公社化就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来促进生产和发展。很显然,“三面红旗”就是要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的。但总路线讲干劲缺乏科学精神,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高指标超越阶段的发展;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也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的积极性。因此,提出“三面红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穷”和“白”的问题,但由于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违背发展规律,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破坏,造成三年严重困难。毛泽东的思路是:穷→急→“左”,因“穷”而“急”,因“急”而“左”,因“左”而破坏经济的发展。这段违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铭记在心的,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成为邓小平和党中央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历史资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由于背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作出的一些决策(包括重大决策),建立的一些制度、体制,实施的一些方针政策,历史表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必须进行改革。比如人民公社,在邓小平领导下,果断地进行了外科手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受到全国城乡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欢迎。紧接着对所有制的改革,缩小公有制,允许私有制发展(资本家所有制,个体所有制),鼓励混合所

有制发展,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对分配原则的改革,等等。当初建立这些体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行改革开放后,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对其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进行改革的。改革这些制度、体制的理论根据,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2 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

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近现代中国的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在破和立中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大步,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是历史的结论。但历史又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实行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前进,反而会阻碍甚至会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漫长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几乎葬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阶级斗争为纲成了社会主义前进发展的破坏力。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首先反省的就是这个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中国要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果断的做出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第一要务。这是邓小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第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极影响感受颇深。在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不仅伤害了广大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影响党群关系,而且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只搞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力怎么会富裕呢?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实现现代化,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以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面对现实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使他果断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停止阶级斗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只是不那么普遍存在,不那么激烈存在,不是主要矛盾,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要影响中心工作。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建设为“纲”,“纲”举目张,以经济建设带动社会主义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不是“全面”,还有“非中心”;“第一”不是“唯一”,还有第二、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要把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时也要求以经济工作带动其他工作,不是单打一,不顾其他工作,更不能以抓“中心”工作为由影响妨碍其他工作。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了出来。“八大”提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也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一矛盾。只是“八大”提出后不久,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否定了,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提出了经济建设中心论,不仅恢复了“八大”的观点,而且更加完善发展了“八大”的精神。

邓小平明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管你搞什么,都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方针、政策,不管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还是上层建筑方面的,不管是来自书本的,还是来自别国经验,都在改革之列。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决心这么大,之所以卓有成效,跟邓小平及以后历任中央领导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密切相关。

### 3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提法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但实际上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是统一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三原则上。根据就是:(1)这三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的指导原则,我们一直把这三原则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2)过去,我们凡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习惯地强调社会主义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3)历来是用这三条原则来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大家都清楚,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姓“社”,与其相对立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是姓“资”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时,才说清楚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至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到今天人们还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规定。所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是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的,这是符合当时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1991年南巡谈话,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时,没有再重复以往的说法,而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以为,邓小平在表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没有重复过去的说法,而是作了新的表述,这是作了重要考虑的,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故而才有新的说法。

比较新老两种说法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旧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着眼于社会主义结构的优越性,这是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邓小平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则着眼于社会主义功能的优越。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来显示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点在于,“结构”是静态的,“功能”是动态的,“结构”与“功能”有联系,但“结构”不等于“功能”。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不等于就能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就看社会主义的“结构”能不能产生好的“功能”。所以着眼“功能”的“本质观”应比着眼于“结构”的“本质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旧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着眼的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而邓小平的“本质观”着眼的是人,是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考虑的还是人民,而实现这些又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满足全体人民富裕生活的要求,这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的本质属性。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不再重复传统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三原则”呢?我想,可能他认识到“三原则”不适应社会主义初阶段的国情,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再照搬,这点,从他对“三原则”的重大改革,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提法主要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这跟他不同意完全照搬“三原则”也是有关的。他既然已决定改革“三原则”,为什么还要照搬呢?

### 4 所有制的变化:由单一的全面的公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为主体

### 5 经济体制的变化: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变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6 分配制度的变化: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变化到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素分配为辅<sup>①</sup>

经济领域的这三种变化,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在改革变化之前,它们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未来社会主义设计的指导原则,都是姓“社”的本质属性,都是单一存在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就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就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而在改革以后,它们在经济领域角色存在也有共同点:比如所有制,公有制不再是“唯一”,而变成“主体”,还有非主体包括私有制的其他经济成分,经济体制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体制(这是邓小平的本来思想,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现在看的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与和市场经济相

<sup>①</sup> 经济领域的三种变化(即本文的4、5、6部分),为了论述方便,考虑着眼于共同点加以统一评析。

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后来宣传上又只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不提计划经济。到党的“十八大”又明确提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在分配上,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唯一”,还有按要素分配(比如资本技术也可参加分配)这是“为辅”。在“三原则”中,变化最大的是计划经济,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计划经济是姓“社”的,与之相对立的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这是非常明确;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根本制度,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恐怕国内认识并不统一,“十八大”以后,大家的认识比较多的统一在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重要作用上。

对这三方面的变化,故不一一评析,只就着眼于它们的共同点加以统一评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中央在经济领域进行了这三项重要的改革<sup>[4]</sup>。是改革力度最大,国内外议论最多,改革的成效最为显著的三项改革。为什么要对被传统社会主义确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标志的三项规定进行改革呢?主要是它们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邓小平明确的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sup>[1]149</sup>

传统社会主义实行的这三项规定,是马恩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提出来的,过去一直被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其实,这三项原则并不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只是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的设想,并未为实践证明是真理。第一,马恩的设想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而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恩设想的前提并不存在。第二,苏联、东欧和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实践了马恩的这三项原则,但毫无例外地都证明这三项原则并不适合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指导传统社会主义的这三项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将完全的公有制经济改革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经济体制上,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体制(党的十八大以后,明确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相结合);在分配体制上,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改为按劳分配为主、要素分配(比如资本要素)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的结合。这是三项最重大的改革,其他多项改革都是在这三项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这样说,不进行这三项改革就没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这三项改革的成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意义极为重大。

进行如此重大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既要有理论勇气,又要有实践胆量。首先,这三项改革是对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原则”的全新认识,重新评价“三原则”,突破马恩的设想,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借改革创新为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其次,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以“三原则”为指导的,把坚持“三原则”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对“三原则”进行重大改革,会被一些人怀疑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行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再次,马恩的“三原则”一直是作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界的标志,是捍卫社会主义攻击资本主义的利器,对“三原则”进行重要改革,这是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向资本主义投降。

在改革开放初期,敢于下这样的决心,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这只有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才能做到,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一时冲动,不是个别的想法,而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宽广的实践背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以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量是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怎么搞,不能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里找到答案,只能从国情出发,从实践出发,总结经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第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经过实践检验,

对的,就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错的,就抛弃,并从中吸取教训;片面的,有缺陷的,就补充,完善,并加以改革,使其完善起来。苏东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马恩当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有片面性的,是不完全正确的,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完全抛弃,而必须进行补充和改革。第三,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的改革要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但一切决策、措施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总依据。我国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四,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内心要求。因此,所作出的许多改革决策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改革提出和推广的动力之源。对“三项原则”的重大改革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一切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党和人民皆大高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改革为民,人民是改革最坚强的后盾,我们党从人民那里获得了支撑改革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量。

## 7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取代“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论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内突出阶级斗争,对外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在 60 多年中,都是坚持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列宁的时代主题论认为:第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内残酷镇压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对外进行疯狂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已经进入腐朽、没落垂死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反抗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联合起来,必将很快把国际资本主义送进坟墓。第三,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而世界上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第四,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是对着干。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是你死我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本国要尽快消灭资本主义,使其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同时,要进行“革命输出”,全力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反殖民斗争,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第五,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抵御资本主义的武装进攻,还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论基本精神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阶段,无产阶级应该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向资本主义发起主动进攻,尽快把资本主义送进坟墓。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虽有深刻的分析,但认为资本主义已到垂死的阶段,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向资本主义进攻,和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决战,这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矛盾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sup>[1]105</sup>他特别强调,“世界总的局势在变”,这是我们发展的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利用几十年的和平环境获得较快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1]15</sup>邓小平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规定了对外开放的指导性方针。

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论有着丰富的内涵。第一,当今世界,战争不是主要的,虽然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战争与革命不是主要潮流。第二,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依然在起作用,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资本主义还在发展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长期共存,和平相处,竞争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借鉴。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既要摒弃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因素,又要吸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第四,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走出去,请进来,以国际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经济全球化是实践“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结果,是时代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入这个大潮流中去。第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要以自己的发展优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能靠暴力来解决,必须靠长期的和平竞争与发展。

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论着眼于在争取世界和平基础上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是正确认识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奠定了明确而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

## 8 由封闭转向开放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张闭关自守的党,闭关锁国也不是新中国的国策。建国后,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结盟,特别是朝鲜战争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我们要搞建设出不去,进不来,资本主义国家封闭我们,我们想开放也开放不起来。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妄图孤立我们,又对我们搞封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依靠外国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的思想出现“左”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四人帮”把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在“反帝反修”的旗号下,把对外开放学习别国经验说成是搞“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起来,谈洋色变,造成了中国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快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指示:要“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提出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在对外开放中进行经济建设。为了学习外国,了解外国特别是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派出了一批又一批考察团出国,收获很大。光1978年,邓小平就四次出访七个国家,他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现代化水平,对中日间经济技术发展的巨大差距留下深刻印象。在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当他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每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感慨的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指出,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提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强国。他在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也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他当即就表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

通过历史反思和出国访问、比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开放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提出并论证了中外技术交流的必然性,提出要把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要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提到突出位置,要抓住有利的国内外条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邓小平的论述,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决策的同时,提出了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对外经济工作方针”,正式拉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为贯彻对外开放方针,中央实施了对外开放的许多重要措施: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紧接着又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对外开放理念又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把“对外开放——发展中国”提升到“对外开放——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境界,他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构建了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体现了三者的战略关联。他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宗旨,坚持“共赢主义”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宗旨,以中国对外的全面开放推动世界的合作发展。

## 9 竞争——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

当今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竞争。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放眼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城市还是乡村,最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规律,



充彻着市场精神。市场经济市场精神的本质就是竞争。人类社会从战争掠夺、暴力征服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竞争精神是从前几世纪开始的独特的时代精神,21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仍然需要这种精神。没有竞争社会死水一潭,没有波澜,就没有活力。没有竞争就没有危机,没有动力,就会停滞不前。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没有效率。因此,不仅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竞争是不可或缺的。

但竞争也会产生和拉大竞争对象之间的差距,产生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竞争会产生少数亿万富翁,也会产生数十倍、数百倍、数千倍的贫民。竞争会产生效率,但也会产生不公平。恶性竞争会引起人们心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度紧张,甚至会导致彼此之间的恶斗。人类社会发展到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今天,竞争引起的社会 and 人类精神上的种种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还必须提倡一种精神——合作。竞争——合作这才是我们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改变,这就是要从矛盾对立,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的二元对立走向矛盾双方的合作,实现对立面的统一,这就要求用结合对立面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问题。市场规律,自由竞争天然地只会拉大而不是缩小人们之间的距离,只会使已有的差异扩大,而不会使差异缩小。因此,要提倡竞争对象之间的合作。从竞争走向合作,或者又竞争又合作,这是时代的更进一步,也是社会发展的更高要求。为适应这种时代精神,人们从竞争取胜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竞争合作取胜或合作双赢,共存共荣的思维方式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文革动乱之后,总结了教训,自觉地抛弃了斗争哲学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就代表党中央向国内外宣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邓小平开始的几届中央领导在处理国内外的重大矛盾和事务中,总的方针是强调“和”,吃而不是强调“斗”,强调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在政治思维中已经摆脱了“斗”中取胜的范式。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我们提倡合作精神,但不是否定竞争,只是以合作来补竞争之不足,这就是竞争——合作。我们提出解决矛盾要用“合作”“统一”“和”的办法,不是取消矛盾斗争,必要的斗争还是需要的,只是不要“斗争”过度,不要只用“斗争”方法,要考虑“结合”“统一”的方法,有些矛盾要少用“斗争”多用“合作”可能解决的更快更好。客观世界“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它比矛盾存在更为普遍。差异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变化:一是,差异的双方之间有了对立(差异并不等于对立),差异就能化成矛盾,原来的差异关系就变成了矛盾关系。二是差异双方之间的差别在缩小,最后走向统一。对待差异,应该有新的思维:一是差异不等于矛盾,把差异等于矛盾,这是矛盾扩大化。二是有差异的两个事物要互相包容互相补充,和平共处,不使对立产生,不让差异转成矛盾。三是不要人为地扩大差异,不要人为的制造差异双方的对立,更不要人为地把差异一步步演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要尽可能缩小差异,促成双方的统一。要尽可能把对抗性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矛盾,要把矛盾关系变为互相包容的差异关系。这些哲学道理比较抽象,但结合实际思考,就变得具体了。减少斗争,增加合作,缩小对立,加强包容,这是新时期处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也是国家处理政治、经济关系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应该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国际纠纷的思维方式。

时代变化了,实践主题改变了,矛盾的性质不同了。因此解决矛盾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也要改变。哲学思维是时代精神的要求,要随着时代精神的改变而改变。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郑志国.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牵引改革[J].南方经济,2014(10):124-128.

(责任校对 王小飞)